

【一座城市,一个故事的再发现,捻开细看】


 扫码提取
浙江文物考古更多往事

他是新中国第一代 浙江文物考古人 跑了一辈子 圈出100处 浙江省 重点文保



王士伦(左)和牟永抗在西湖边

300字方格纸,46页,西湖、岳飞墓、胡庆余堂、飞来峰、白塔……熟悉的地名字眼,在阁楼的阳光里跳动。

不久前,王群力、王牧兄妹才发现父亲留下的这叠《业务自传》手稿,仿佛又见爸爸开了灯,伏在方格稿上。

王士伦,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(1984年~1993年),他也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(省考古所前身)里的第一批年轻人,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。

他的墓里,放了一支笔,一副眼镜,代表笔耕和目光。

爸爸一天到晚在写东西。爸爸不善于流露感情。

在看到这本手写自传前,兄妹俩对父亲跑了一生,写了一辈子的“文物古迹”,又近又远,有一点疏离。但他们知道,爸爸身上有一种极大的使命感。

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?

本报记者 马黎

【参考文献】

《岳飞墓地考》《关于建立文物学的探讨》
《再论文物史迹网》《浙江出土铜镜(修订本)》
《浙江文物与古迹》
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等

台上是豪华级导师阵容 台下是新中国首代考古“小鲜肉”

1953年5月初,24岁的小镇青年王士伦来到杭州,到一个新单位报到。眼前这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,完全是另一个审美天地。

上世纪30年代,施昕更先生在良渚的发现,成为浙江考古的发轫。但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。直到新中国成立,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开展,考古急需补充新鲜血液。

环城西路20号,如今的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,70年前,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,里面诞生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文管会)。

王士伦在这里听了无数的“课”: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每周四主讲龙泉青瓷,还有郦承铨、沙孟海、张任政、宋云彬、沈镜如等“大先生”,讲的是铜器、碑刻、版本、瓷器、中国近代史、太平天国史等等。

1952年6月,由文化部、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培训班开班。此前,新中国还没有大学设考古专业。两年后,25岁的王士伦和21岁的牟永抗参加了第三期。

王群力找到一张旧照片,父亲和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牟永抗站在西湖边,“小鲜肉”级别的侧颜,凝视着前方。人生下半场的伏笔,似乎已埋下,他们对将要为之倾入一生的事业有前程锦绣的预感。

2013年,牟先生曾跟我讲过这三个月学了什么:一半室内讲学,一半野外实习。老师有研究原始社会考古的尹达,教封建社会史的翦伯赞,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裴文中,还有教奴隶社会史的郭沫若……

此后几十年,中国文物考古事业正由讲座下的这批新生力量开创——牟先生曾给我看过一张老照片,他和培训班同学们参加半坡遗址发掘工作,神采飞扬,笑得开怀。他搭着肩的年轻人叫高至喜,后来成为湖南省博物馆馆长,主持马王堆考古发掘。前排右一,便是王士伦。

爬遍杭州的山摸底石窟 每天写文章写到胃痛

王士伦早先的听课笔记和后来的业务自传,笔迹截然不同,像两个人写的。前者花俏、极有个性,而后者端正,隶书味重。

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改变?

1953年11月,院子里来了一位重磅专家,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的朱家济,52岁。此时,浙江的文物保护工作,几乎还是一张白纸——浙江省到底有多少文物家底,保存情况如何,哪些需要保护,怎么保护?还没有构建起基本理论和方法。朱家济开始全面负责浙江地面文物的勘察、保护、维修工作,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。

文管会的重要任务和职责,是建立起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。朱家济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省,王士伦跟着他,专题调查了杭州古代石窟造像,爬遍了飞来峰、烟霞洞、石屋洞、南观音洞以及城隍山、凤凰山、葛岭、慈云岭和江干天龙寺后山、净慈寺后面的石佛洞等处,实地查看。

王群力在旧相册里翻到一张照片,爸爸穿着时髦的卡其色风衣,背禄莱相机,朱家济先生穿着老棉袄,好像被摄影师叫了一声,转头,定格了圆圆萌萌的脸。

王士伦开始跟着朱家济学书法,风格大变。更重要的是,打好了学术审美和格局的底子。

这一点,陈梦家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位青铜器、甲骨文领域的著名学者,吃惊于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,能选择铜镜作为学术主题,每天在写字台前写文章。

27岁,王士伦完成了第一本著作《浙江出土铜镜选集》,1958年1月出版,对浙江出土铜镜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古调查和研究。

写这本书,妈妈说爸爸:悬梁刺股。夏天天热,蚊子又多,他在地上放一只水桶,脚浸在水里,继续写;他胃病厉害,写稿到胃痛,用铁锅把盐炒热,敷在痛处。

第一本书出版,爸爸用稿费买了只欧米茄手表——孩子都惊讶,爸爸竟然对生活有美的追求。王群力人生第一双皮鞋,17块5毛,猪皮做的。“你应该买好一点。”爸爸给他去定做了一双牛皮皮鞋。

王士伦在浙江的田野调查,紧随朱家济的脚步,对浙江历史文物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,仅做过专题调查的浙江古塔就有50多座。

他说,作为具体工作来说,朱家济先生是立过大功的,自己是“起作用”。

从一张白纸到构建文物史迹网 他用脚丈量出100处省重点文保

王群力12岁开始学书法,爸爸嘴里经常提起沙孟海,“沙先生说的,笔笔力都要到。”小王嘀咕,为什么不直接介绍沙孟海先生给我认识呢?爸爸根深蒂固的思想,你的价值完全在于自己的本事,靠拉拉扯扯,没有任何意义。

小王说,爸爸这个人,太直,单一。不看闲书,不看文艺作品,只看专业书,没有文学底子,只有论文底子。

他提出了浙江省第一、二批重点文保单位名单。这100处,全部脚步丈量。这是一条难走的路,他却不以为苦。

王士伦深信:成果来自勤奋。他说过:为了弥补学识上的先天不足,我始终坚持刻苦自学,特别是从事文物考古专业工作三十年来,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自修到半夜。

但王群力很佩服爸爸一点,有一种宏观思考的能力,比如他反复论述过的“文物史迹网”这个复杂的概念。

1960年,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提出,要使文物保护单位构成历史网络。王士伦听到了心里——必须构建浙江文物史迹网。

这种思维方式、学术构架,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些超前。他认为文物保护单位形成的史迹网,应该反映出各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(包括历史人物),反映出各时代的社会制度、社会生产、社会生活,包括的内容如古文化遗址、古墓、古建筑、宗教遗迹、石窟寺、碑刻帖石、摩崖题记、纪念建筑、其他历史遗迹,“我暂且统称为文物史迹。”

但是,众多的文物史迹都在野外,几经沧桑。因此要构成文物史迹网,首先是普查,在其基础上进行选择,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王士伦提出了浙江省第一、二批重点文保单位名单。这100处,全部脚步丈量。这是一条难走的路,他却不以为苦。

在成分复杂的历史中,他重新划重点,比如,五代吴越和南宋的历史重点在杭州,海外交通的历史重点在宁波,明代抗倭历史的重点在台州等。再就文物史迹的性质来说,他认为也要在历史发展的纵线上形成系统,如瓷窑,按时代和窑系形成系统;古建筑按类别各自形成系统。

1969年,父亲要离家。他把家里的两个木板箱漆成黑色,用来装书。考虑到不知道何时可以回来,父母商量着,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。

这是一家四口极为少数的合影。爸爸很难得地穿上了正式的中山装,妈妈做了头,是精心打扮的,人却很消瘦。

1969年的冬天特别冷。小王去看望爸爸,高低铺里,飘出大烟圈套着小烟圈,那是朱家济先生在抽烟。

几天后,12月29日凌晨,朱家济起夜去厕所,滑倒在地,去世。

王士伦没有在家里提起过这件事,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。但在自传里,我找到了一句话:朱家济先生去世,我孤军奋战。(下接3版)